



#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基本形态论析

王 樊

(西安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西安 710049)

**摘 要:**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具有历史厚蕴、大国气象、世界情怀的鲜明民族标识,亦是多种形态汇通交融的现代文明复合形态。从总体上来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综合了“中华传统文化”“新的文化生命体”“中华民族共同体”“共产主义愿景”“数智生产力”“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中华民族特色和现代文明理念,兼具“五位一体”现代文明的显著成就,是融贯古今、汇通中外的大文明形态。具体地,从社会历史、理论内核、建设主体、社会性质、现代生产力、世界视野等维度分别阐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基本形态构成,认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赓续发展了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铸就了以我为主的文化生命体形态,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态、人民至上的社会主义文明形态,形成了内含新质生产力的数智文明形态、胸怀天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态等现代文明形态。科学把握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基本形态,有利于推进当代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理论构建和科学阐释。

**关键词:**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华文明;中华民族共同体;新质生产力;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 D61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3-3851 (2025) 02-0001-09

## Analysis of the basic forms of the Chinese modern civilization

WANG Fan

(School of Marxism,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 China)

**Abstract:** The Chinese modern civilization is a distinct national symbol with rich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great power atmosphere, and global sentiment. It is also a composite form of modern civilization that integrates various forms. Overall, the Chinese modern civilization integrates Chinese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modern civilization concepts such as "traditional Chinese civilization", "new cultural life forms",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communist vision", "digital productivity" and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It is a significant achievement of the "five-in-one" modern civilization and a great form of civilization that integrates ancient and modern times and connects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Specifically, the article elaborates on the basic forms of Chinese modern civilization from the dimensions of social history, theoretical core, construction subject, social nature, modern productivity, and global perspective. The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Chinese modern civilization has continued to develop the modern form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forged a cultural life form centered on oneself, and formed a diverse and integrated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form, a socialist civilization form that puts people first, a digital civilization form with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and a community form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that embraces the world. Scientifically grasping the basic forms of Chinese modern civilization is conducive to promoting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nd scientific interpretation of

收稿日期:2024-07-14 网络出版日期:2024-10-24

基金项目:教育部高校思政教师研究专项重大课题攻关项目(23JDSZK02);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队伍培训研修中心(西安交通大学)课题(XJTUSZ2023013)

作者简介:王 樊(1995—),女,四川苍溪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方面的研究。

contemporary Chinese modern civilization.

**Key words:** the Chinese modern civilization; Chinese civilization;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of mankind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重要命题。自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9月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强调“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sup>[1]</sup>以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成为学界的研究热点。当前,学界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生成逻辑研究。苏玉波等<sup>[2]</sup>认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民族与世界、真理与价值的辩证统一中生成,其又是一个对现实世界具有总体观照性的文明实体和科学概念。二是理论内涵研究。项久雨<sup>[3]</sup>认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由中华文明、社会主义文明、现代文明三种文明要素相互融汇而成的有机总体,是“两个结合”的文明创造物,是民族复兴的文明产物。三是主要特征研究。陈金龙<sup>[4]</sup>认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坚持人民至上的文明、协调发展的文明、创新发展的文明、兼收并蓄的文明、和平发展的文明。四是实践路径研究。燕连福<sup>[5]</sup>认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立足中国实际、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从而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提供实践支撑、精神支撑、活力来源和正确方向。综上所述,学界已从不同视角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生成逻辑、理论内涵、主要特征和实践路径等方面进行了探讨,从过去、现在和未来描摹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整体样态,但是对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具体形态仍缺乏系统论述和深入思考。因此,本文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具体形态出发,从社会历史、理论内核、建设主体、社会性质、现代生产力、世界视野六个维度阐述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具体形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一个内蕴多种形态的现代文明复合形态,需要对其进行不同维度的深层次阐发,从而揭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总体构成及形态表征,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学理阐释力和解释力。

## 一、赓续发展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

从社会历史维度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赓续发展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从“古”与“今”、传统与现代的文明积淀体现了其所具有的连续性、生命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现代文明这一形态存在,现

代性是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本质属性,任何一种文明形态总是以“现代”表征其进步状态和先进面貌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之“现代”具有更新重构中华传统文明的涵义。现代性肇始于近代以来西方资产阶级高举理性大旗摧毁封建制度、建立工业文明的巨大变革中,并随着世界市场的扩展“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sup>[6]35</sup>,将现代文明带到全球各地。这一“现代”内生于资本的“粗陋野蛮之中”<sup>[7]230</sup>,表明现代化并非西方资本文明的“天然注脚”,需要继承对其“肯定的理解”,又要在对其“否定的理解”中开辟新路。中华民族拥有辉煌的古代文明,广袤的土地之上长江黄河一南一北奔流向东,几乎贯穿整片国土,优越的土地、气候、水文条件造就了沉潜深厚的农耕文明,与其相适应的“各种历史文化典籍浩如烟海,其丰富和完备的程度,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相比”<sup>[8]</sup>。但鸦片战争前后,古老中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sup>[6]632</sup>,相对于西方现代工业文明处于“低位势”的被动状态,列强的相继入侵使其陷入“文明蒙尘”的悲惨境遇之中。中华文明由此面临着同时超越现代资本文明和中华传统文明的双重变革转型问题。

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赓续发展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其生成与发展自然首先面临“走向现代”的变革转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经过了由“传统”而“现代”自发建设到自觉建设的历史阶段,中国近代史上的文明现代转型问题,指向“中国向何处去”,关涉民族存亡、文明延续,关键在于排除阻滞因素、走上现代化道路;当前中华文明的现代发展问题,关涉民族复兴、国家富强,关键在于中国式现代化。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国门,也打开了中国被迫学习西方现代化之路。但直到“五四运动”,中国人都无法摆脱“先生老是侵略学生”的局面,“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sup>[9]</sup>。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扭转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精神颓势,赋予中国现代化探索以主动力量,在中国大地上实现了中华文明与现代化的双向互动。现代文明较之传统文明的主要进步在于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中华传统文明本质上是一种农业文明,隶属于前现代性文明,而西方文明本质上是一种工业文明,隶属于现代性文明。工业文明具有比农业文明更先进的生产力属

性,那么前现代性文明自然无法抵挡现代性文明的冲击<sup>[4]</sup>,不可避免地造成“东方从属于西方”“农业民族从属于工业民族”的不平等世界格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华传统文明的延续,它既保留了中华文明突出特性和独特优势,也克服了其历史局限,注入工业文明、信息文明的先进生产力基因,赋予中华文明以当代生机与活力,促进了中华文明的现代性变革。

中华文明构筑了现代化建设的中国基因,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深厚的文明底蕴。例如,中华文明彰显民族身份,蕴含着丰富的中国语言文字、中国古代教育、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史学等;较为成熟的、领先于世界的科技文明、农业文明、医学文明和政治文明等;深沉高迈的文明精神内核,如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等。然时移世异,文明发展需要吐故纳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sup>[1]</sup>。就传统的积极意义而言,人们“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sup>[6]470-471</sup>历史,传统文化蕴含着古人独特的智慧和思维方式,表征着中华文明的鲜明特质和精神标识,中国人民为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而自豪,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能够使之适应现代社会,“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就传统的消极意义而言,“传统是一种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惯性力,但是它是消极的,所以一定要被摧毁。”<sup>[10]</sup>中国古代有轻视体力劳动的传统观念、缺乏进取精神的保守思想、唯书唯上的教条主义、专擅杀戮的法治主义等文化糟粕,常常与宗法制度和官僚等级制度相配合,表现出封建性、落后性的一面,理性识别这些成分是摆脱羁绊、走向未来的文化前提。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立足以往文明成果,向现代化方向演进,不断以继承性彰显“走向历史的深处”,以创新性昭示“走向更远的未来”。

现代化赋予传统文明以深厚力量,中国式现代化在实质上赋予了中华文明以现代性力量,也从根本上规定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内容、性质及方向。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体现了多数人进入现代社会这一我国国情基本特性,规定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现代化建设的主体力量,要求从总体上满足各族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体现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共享特质,规定了中华民族文明的扎实物质根基,要求创造整体上实现社会公平、人人享有的现代文明;物质文明和精神

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体现了生活于新文明之中的人的立体性与丰富性,规定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全面性,避免人们成为“单向度的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体现了现代人的生态属性,规定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可持续性,要求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体现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和平性,规定了文明对外和平交往的理念、方式和路径,要求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 二、以我为主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形态

从理论内核维度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以我为主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形态。文明的首要前提和核心要义是文化,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首先是一种文化形态但又不局限于此的文明形态。因此,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首要要求就是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提出鲜明体现了形成以我为主的新的文化生命体形态的内在要求。从词源上考察,“中华”“中国”以文明有无、文化多寡作夷夏之辨、内外之分。“中华者,中国也。亲被王教,自属中国,衣冠威仪,习俗孝悌,居身礼义,故谓之中国。”(《唐律疏议》)“中国”,即有“文明中心”之意,中华文明因其文化影响力向外辐射,形成“中华文化圈”;孔子所认为的“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八佾》),也是从文化繁荣、人文教化的层面指称文明进步状态的。质言之,“中华”“中国”是“文化”“文明”之国,前者以后者为核心要义。今天中国人民树立文化主体性意识,自然就面临着中华文明的身份认同与建构问题。黑格尔认为,欧洲人只要一提到古希腊就自然而然地会产生一种家园之感;而中华文化作为中国各民族的共有精神结晶,天然能唤起中国人民的寻根之情。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具有鲜明的中华品格,具有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突出特性,中华文化中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价值观念集中体现了中华文明“质”的规定性,也是中华民族至今能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独特优势。

文运与国运相牵,文脉与国脉相连。晚清以降,国运衰微,中国知识分子陷入了对这片家园的怀疑,有识之士纷纷期盼中华文明新面貌的出现。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分别以“老大帝国”和“少年中国”指代中华传统文明和中华现代文明。日益丧失活力的中华传统文明“惟保守也,故永旧”;生机勃勃的中华现代文明“惟进取也,故日新”<sup>[11]</sup>。“少年中国”还



需“中国少年”。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文章《敬告青年》中歌颂中国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这恰如他期待的中华新文明。他认为“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sup>[12]</sup>，这正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规律相辉映。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有如百年前先辈口中的“少年中国”，以“健康”“隆盛”的面貌进入新的生命进程。纵观人类社会兴衰沉浮的历史，任一文明进步、民族崛起总是同其内部的文化创新、思想突破深度关联的。时代呼唤树立新文化“中华”之主体地位，以坚定的文化主体性巩固文明新样态。在新时代“两个大局”交织互动中，只有立足民族文化之根脉，我们才能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

中华文明从古至今，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经历了“正一反一合”的矛盾运动阶段，呈现辩证发展图景。近代以来，为了探索文明发展新路，中华民族历经了从“复制器物”到“照搬制度”、再到“再造文化”的探索历程，对西方文明的态度也历经“俯视”到“仰视”、再到“平视”的转变。相比于辉煌的古代文明、蒙尘的近代文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一种拥有更高层次文化主体性的文明形态。在世界文明格局中，予中华文明以何定位，涉及“古今中西之争”。关于这一问题，曾存在着“文化自卑论”“文化自信论”“文化自负论”等论调。在近代国门叩开之前，中华文明始终处于“文化自信”状态；近年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深入开展，无可争辩地证实了中华文明的辉煌过去“呈现出独立、完整、成熟的文明主体性特征”<sup>[13]</sup>。“文化自卑论”产生于近代以来中华文明在与西方工业文明交锋中惨败，遭遇“三千年之未有之大变局”之际，彼时部分国人滋生了“文化自卑”“文明失落”情绪，文化主体性的失落造成人们精神家园丧失、文化身份迷茫，甚至鼓吹趋附强势文明的“全盘西化论”。文化主体性作为相成性属性，需在开放心态、比较视野中显明，否则要么孤芳自赏、顾影自怜，要么妄自菲薄、自断根脉。在清朝中后期，统治者夜郎自大、闭目塞听，认为“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拒绝同彼时已处于人类领先地位的西方工业文明交流；也有知识分子抱残守缺、以己之长比人之短，片面夸大中华文化优越性、遮蔽其不足，此则“文化自负论”。“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sup>[1]</sup>，增强了中国人的历史主动精神，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

合的百年征程中，融合再造的新文化这一“批判的武器”变成“武器的批判”，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改造社会、建设国家的“物质力量”。今天中国人民持续焕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激情，现代化事业蒸蒸日上，文化自信自强愈发彰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历史性出场并确立起高度的文化主体性。

随着中国式“文明复兴”的推进，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文化自信成为推动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在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历史征程上，如何坚持和巩固文化主体性，这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前提性问题。显扬中华文明之主体性，需破解近代以来甚嚣尘上的“古今中西之争”，继续用好毛泽东所倡导的“古今中外法”。与文明关涉“什么是好的”相比，文化则更关注“什么是我们的”<sup>[14]</sup>。文化是民族自我的身份标定，文明则具有开放性的普遍意义。从“文化小我”到“文明大我”的视域延伸，能够促进人类文明秩序重建、文明价值重构，故由中华文化主体性标定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其先进性质有益于人类走向更加美好的文明图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构和确证了“文化自我”身份，坚持以马克思主义“魂脉”为引领，充分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精华，树立“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文化借鉴原则，在“古今中西”大结构中生成了集众家之长的一种崭新文化生命体。今天，在新的起点上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既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应有之义，又能推动文明形态意义上中华民族的历史性崛起。

### 三、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态

从建设主体维度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由中华各民族所创造，从历史、理论和现实上揭示了其是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态。“中华民族”是一个整体，但从构词上看，“中华”侧重地理位置和国别属性，“民族”侧重人民地位和聚合方式，是人类基于群居本能、最有生命力和凝聚力的社会组织形式<sup>[15]</sup>。“民族”一词属于和制汉语，最初由日本传入。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首次提出“中国民族”“中华民族”概念，从文脉、地缘、血缘的层面强调这一共同体的整体性，在民族危亡的年代，欲以此激发民族凝聚力以“保种保族”。而后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之民族主义“五族共和”思想，强调了在中国的五大家族汉满蒙回藏和谐相处、共建共和国。费孝通

从民族学的视角概述中国历史,明确指出中华民族是既一体又多元的复合体。在长期发展中,中华民族在团结统一的历史主流中逐渐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各民族交错杂居、和睦相处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民族实体,经历了从“自在”走向“自觉”的过程。中华民族这一“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sup>[16]</sup>,在此过程中各民族血缘认同、文化认同、历史认同和政治认同不断增强,造就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但自在的民族不是自觉的民族。现代意义上中华民族则是近代以来在中国人民求生存谋独立的不懈斗争中获得历史性重塑的,人民与国家同构是中华民族走向自觉的核心表征。鸦片战争后一段时期内,中国只有少部分人具有朦胧的民族意识;甲午海战败绩后,强烈的亡国灭种危机感使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空前高涨;“五四运动”的爆发,充分调动了社会各阶级群众的爱国热情,至此,各社会阶级都已相继登上救亡图存的历史舞台;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根本上发动了人民群众力量,不断取得了革命、建设和改革成就,彻底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一盘散沙的局面,民族凝聚力显著增强,重塑了中华民族格局。“在百年抗争中,各族人民血流到了一起、心聚在了一起,共同体意识空前增强,中华民族实现了从自在到自觉的伟大转变。”<sup>[17]</sup>自觉的中华民族以共同体的样态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性出场提供了民族性前提和人民性合力。

中华民族是创造中华文明的核心力量,中华文明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纽带。较之于“中华现代文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更能体现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创造现代文明的“民族主体性”,而这一“民族主体性”也是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性”的时代反映<sup>[18]</sup>。恩格斯指出:“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社会的素质。”<sup>[7]97</sup>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以中华民族共同体为归属主体和实践主体,其不仅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传统文明,而且正在继续创造气象万千的现代文明。从历史上看,秦朝建立了“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礼记·中庸》)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态,为中国历史奠定了具有文化意义的统一制度。在此后两千多年里,民族迁徙使游牧文明和农业文明相互融合,“大一统”成为中国历史的主流和各族人民的理想追求,各民族文明汇聚成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华文明。就当代而言,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仍是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主体力量。中国共产党在治国理政中,坚持巩固和发展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始终将实

现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充分激发人民的历史主动精神,“群众生气勃勃的创造力正是新的社会生活的基本因素”<sup>[19]</sup>,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创造成果聚合成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了文明基础,为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提供了文明支撑。

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sup>[20]</sup>,“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sup>[7]571</sup>。身处中华民族共同体中的中国人不仅获得了全面发展、成为“现代人”的条件和要素,更以“现代人”的无限创造伟力贡献了文明成果,巩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人民群众既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主体,更是文明成果的需求主体和最终受益主体。新时代中国,物质文明蓬勃发展,人民生活更加富足;精神文明成果丰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实践深入人心;社会文明持续进步,社会公平正义更加明显;生态文明谱写新篇,人民在“绿水青山”拥有优质环境获得感。“五大文明”协调共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彰显出鲜明的属人性。在当代,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一“真正的共同体”的先进本质使人从物质困苦、政治奴役、精神虚无、交往异化、生态恶化的“不发展”状态摆脱出来,以“现代人”的面貌存于世并充分发挥主体力量,以人的现代化巩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

#### 四、人民至上的社会主义文明形态

从社会性质维度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人民至上的社会主义文明形态,而显著区别于西方资本逻辑的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为现代文明建设提供了制度前提。文明是古往今来人类赖以生存、谋求发展的物质载体和时空场域,也是人类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智慧结晶,是“人猿相揖别”的本质所指。人类对于满足需要、实现价值的追求和确证是其社会性本能,在人类对这种本能的运用和发挥中文明形态生成和演进,所谓“文明的逻辑”由此产生。在马克思的“文明批判”视野中,资本主义文明是其主要所指,这一文明形态既具有“伟大的文明作用”<sup>[21]</sup>,又“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sup>[22]</sup>,违背人民总体利益。马克思以资本文明为原点,“从后思索”人类自进入阶级社会以来的文明史,着眼于文明进程中的矛盾和对抗关系论述了文明形态螺旋式上升过程。“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最后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没有对



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sup>[23]</sup>内生于资本文明不可克服困难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文明形态将超越资产阶级的狭隘眼界,终结“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sup>[6]592</sup>。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社会主义性质,正依循着这一人类文明发展规律而来。受资本宰制的资本主义文明从根本上限制、阻碍了人的发展,而体现人民至上的社会主义文明符合历史规律,贴合人民群众愿望,印证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人民至上的社会主义文明形态。

从人类历史总体演进趋势看,文明形态总是呈现上升态势并指向光明未来的。无论是以生产方式划分的社会形态“五形态说”,还是以人的发展程度划分的社会形态“三形态说”,都最终指向共产主义社会和自由人联合体,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孜孜以求。在当下的中国,历史趋势的必然性规律和历史主体的能动性实践在社会主义文明中融汇,人类历史的“普遍性”规律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特殊性”时空条件下绽放出来,这一“特殊性”将为人类文明进步带来更多可能性。马克思主义这一诞生于欧洲文明世界的理论体系在中国的时空转场中,“两个结合”的理念和实践使其深深扎根于中华文明之中,“中华文化中朴素的社会主义元素也提供了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基础”<sup>[1]</sup>,中华文明由此具有社会主义性质。“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sup>[7]13</sup>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结合”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出场分别是中国社会主义文明形态探索的理论和实践方面,二者在其持续演进走向更高级的融合。

毛泽东总结近代中国落后挨打、文明蒙尘的主要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sup>[24]</sup>,这就指明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建设理路。一方面,要实现文明形态的变革——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近代中国历史已经证明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的真理;另一方面,要立足新文明形态加快经济建设、科技发展,以高度发达的生产力水平彰显社会主义文明的优越性。西方先发现代化虽然具有现代化的某些一般规律,并且自视能掌舵领航人类文明,但其内核以历史所证明在人类文明形态演进序列上属于“过去时”;而中国这一后发现代化国家则具有集先发现代化成果大成以达到“时空并联”式快速积累的独特优势,而且“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水平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

文化生活”<sup>[25]</sup>。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旧邦新命”之“新”由此体现为社会主义文明的中国形态之“新”。

社会主义文明形态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核心要义,在道义和践履上超越由资本逻辑主导的资本主义文明形态。我国因国情、历史传统和现实情况不同于西方,因此并未机械复制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路线,而是创造性地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形态。目前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摸索中不断沿着马克思恩格斯预设共产主义的宏阔愿景前进,体现了人民至上的价值愿景。邓小平在对“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本质论述中阐明了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归属。进入新时代以来,在物质层面,生产力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美好生活质量不断提升;在精神层面,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和底气不断增强,人民之历史主动精神不断提升;在制度层面,各项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不断成熟定型,社会主义制度趋向完善,为人民服务的制度基础得以不断夯实,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更加充分,彰显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不同于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人民价值取向。

## 五、形成新质生产力的数智文明形态

从现代生产力维度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形成新质生产力的数智文明形态。构成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之“现代文明”的数智生产力正在改变全球格局和重塑中国形象,我国目前在人工智能领域抢占了发展先机,这一先进数智文明力量正在赋能中华文明。随着数字技术发展,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数智化浪潮正深刻改变着人类社会,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新能源、新材料、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智技术成为推动现代文明建设的新引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这数智化转型中焕发出了新的生机与活力。新质生产力是习近平总书记应对国内外变局、高质量发展经济提出的重要概念,近年来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智文明形态是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内驱动力。生产力是人类在生产实践中所形成的物质力量,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构成了人类社会和全部历史的基础。人类历史上每一次重大科技进步,都带来经济社会发展的质变与飞跃。从根本上说,社会形态的更替就是生产力从旧质到新质、从低质到高质量迭代升级的结果,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根源于生产力的发展与进步。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智技术的快速发展催生了数智文明形态,

这种数智文明是摒弃了传统时代缓慢、低效的信息传递方式和完全依赖自然界生存的方式,是凭借人类智能进行决策和从事复杂劳动的文明形态<sup>[26]</sup>。

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文明进步。恩格斯认为,跨入文明时代的标志是生产力发展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分工、阶级分化等,因为“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的工业和艺术的时期”<sup>[27]</sup>。考察由技术革命促成的人类文明方向可知,“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数字文明”这一进程是一个具有累进性、承续性、阶梯性的客观历史进程。科学技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作用不断增强,一次比一次具有更广泛的影响,且技术革命爆发间隔时间一次比一次短,从农业革命到工业革命用了万年时间,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到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三次科技革命不过几十年时间,到如今以人工智能为驱动的新科技革命以年月迭代和发展更新。

新时代,技术的每一次迭代都伴随着新质生产力的产生。随着数字科技向纵深处发展,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将发生显著改变。中国因未赶上两次工业革命,错失国家发展良机,但自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迎头追赶不断推进现代化建设,直至今日,以数字化为显著特征的中国式现代化格局重塑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整体样貌。当前,以人工智能为标志的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技术的迭代速度不断加快,也在更深层次影响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整体格局。近代以来,中国在发展和布局生产力上整体滞后于西方,落后的生产力也阻滞了中国社会转型发展,在中国逐渐由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转变中,落后的生产力逐渐向先进生产力转向,并呈现与西方先进生产力并行乃至引领之势;发展以数智技术为代表的新质生产力将推动中华文明再铸辉煌,有力推进民族复兴历史进程。在未来的先进、优质生产力领域中国也将占一席之地,并成为引领全球进入数智文明形态的主体力量之一,推进人类加快迈向未来数智时代步伐。

在探索中国式数智文明建设中,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和网络强国建设,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数智形态力量。一是将党的领导贯穿数智文明建设全过程。中国共产党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设起如今的数智文明事业,推进全国数字基础设施总体布局,统筹推进数字经济、数字政务、数字社会、数字文化、数字生态等建设,加快提升了数智文明建设的整体性和系统性。二是不断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数智文明深度融合。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和合包容、爱好和平、勤劳勇敢为数智文明建设中化解风险挑战、缓和主客矛盾提供了坚实的道德基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数智文明形态创新了传播内容,近年来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数字技术”的深度结合,使得历史文化遗产得以数字形式存在和传播,打造了集汉服华饰、诗词歌赋、书法绘画等现代人喜闻乐见的国潮文化。三是以数智形态变革整体推进中华文明建设。以数智文明为动力系统性地推进国家发展,如数字技术赋能乡村振兴、赋能实体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平衡不同地区发展差异,提升城市智慧化和生活智能化水平。在提升人民数字素养方面,助推人民由“要我学”到“我要学”,不断聚合广大人民群众发挥历史主动精神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内聚力和自信力。

## 六、胸怀天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态

从世界视野维度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胸怀天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态,彰显着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而中华文明突出的和平性又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建设者和贡献者。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加深,世界各国交往交流不断增强。“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sup>[6]35</sup>,世界遂连为一体,经济全球化加速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进程。全球化使得世界各国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这一共同体共生共荣、风险共担。并且,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互促共融,中国的发展也在最大程度上增进了世界的和平力量,是加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态的重要力量。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了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所开创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新形态,因此,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内蕴中国人民胸怀天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追求。

相较而言,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和平基因规避了中国走西方现代文明的零和博弈之路。从人类文明进程来看,资本主义文明促进了世界生产力的极大发展,打破了原有闭塞孤立的世界格局,促进了人与人之间广泛的交往,推进了人类文明发展整体进程。但是,西方文明在整体上导致了人与自身、人与人、人与自然等关系的对立和割裂,造成了战争、灾害、贫困、传染病、殖民主义等阻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威胁力量。近年来,逆全球化、孤立主义、单边主义、局部冲突盛行,某些国家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广“自由”“民主”“平等”的所谓普世价值,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干涉他国内政,造成他国人民流离失



所、统治失序,这与全人类共同福祉相背离,更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追求相违背。

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内蕴和平和睦和谐、合作共赢的价值追求,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同构。从历史来看,中华文明历来崇尚“以和邦国”“和而不同”,中华文明的包容特性、合特质及和平精神至今深远影响着中华民族的精神品格,这决定了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决定了中国笃定共谋发展而不会称霸天下。中国共产党在第三个历史决议中提出,将胸怀天下作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基本经验之一,这也是我们党长期坚持的基本原则,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为世界谋大同的正义取向。长期以来,中国为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四个倡议”是回答世界之问、时代之问的最新中国答案;“一带一路”倡议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经济互促互利和文化交流繁荣的新示范,“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等三大倡议为“人类向何处去”指明了前进方向。

在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际,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是关切人类发展难题,这一概念强调合作共赢,异中求同,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注入了新时代的和平与发展基因。马克思指出:“凡是民族作为民族所做的事情,都是他们为人类社会而做的事情。”<sup>[28]</sup>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将推动破解人类共同面临的诸多难题和挑战。中华民族向来具有“和而不同”“和合共生”的深层精神追求,中国没有对外侵略的基因,而当今部分西方人士鼓噪所谓“文明冲突论”“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中国崩溃论”肆意抹黑中国,挑起文明隔阂,构筑文明壁垒。按照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人类进入共产主义文明形态是历史必然,但这一过程是极其漫长的。当下,各国利益关切复杂交织,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长期“两制共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更具有紧迫性和现实性。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关乎人类未来发展的“中国方略”,其主张人类跳出“中心—边缘”“西方—东方”的二元对立模式,构建美美与共的文明主体交往图景,从而推进人类文明发展与共同进步。

## 七、结 语

立足新时代,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命题,学

界对其阐释也在不断向纵深推进。本文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基本形态出发,指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融贯古今、汇通中外的大文明形态,亦是内蕴多种基本形态的现代文明复合形态,具体包括了赓续发展了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以我为主的文化生命体形态、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态、人民至上的社会主义文明形态、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数智文明形态、胸怀天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形态。实践每前进一步,理论则跟进一步。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和中国式现代化持续推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也在持续更新、向前发展,不断健全更新着其形态构成。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为一个面向未来的“应然”与把握现在的“实然”相统一的文明范畴,“实然”开拓“应然”之路,“应然”指引“实然”之路,基于共产主义文明的远景畅想,新时代正续写着中华文明新篇章,这也为今后持续跟进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具体形态研究做了必要铺垫。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J].求是,2023(17):4-11.
- [2] 苏玉波,王樊,殷路豪.唯物史观视域下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出场逻辑及其方法论自觉[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44(5):118-126.
- [3] 项久雨.伟大复兴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J].理论与改革,2023(5):1-10.
- [4] 陈金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生成、特质与价值[J].中国社会科学,2023(8):16-21.
- [5] 燕连福.“第二个结合”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J].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3,9(10):61-72.
- [6]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7]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8] 习近平.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在中央党校2011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N].学习时报,2011-09-05(01).
- [9]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70.
- [10]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21.
- [11]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5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9:1.
- [12] 陈独秀.陈独秀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89.
- [13] 康震.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历史逻辑、实践路径与价值导向[J].中国社会科学,2023(8):4-9.
- [14] 袁祖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理论内蕴及实践进路[J].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3(17):4-13.
- [15] 王希恩.马克思主义对“民族”的借助与超越[J].青海民族研究,2021,32(3):42-50.
- [16] 费孝通.简述我的民族研究经历和思考[J].北京大学学报(哲



- 学社会科学版),1997(2):5-13.
- [17] 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6.
- [18] 朱碧波.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学理逻辑与实践省思[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43(8):9-17.
- [19]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全集:第3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56.
- [20]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394.
- [2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0.
- [2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871.
- [23]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04.
- [24]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4.
- [25]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63.
- [26] 何哲.数智文明:人类文明新形态:基于技术、制度、文化、道德与治理视角[J].电子政务,2023(8):48-60.
- [27]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8.
- [28]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257.

(责任编辑:陈丽琼)